

反腐败纵横谈

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室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

编著

京大学出版社

反腐败纵横谈

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室 编著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腐败纵横谈/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大学
监察室,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5

ISBN 7-301-02528-9

I. 反… II. 北… III. 廉政—建设 IV. D630.9

出版者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310千字

1994年5月第一版 199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0.50元

把反腐敗斗争
持久、深入、更有成
效地进行下去。

侯宗宾
一九九〇年
元月廿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侯宗宾同志的题词

编者的话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第三次全会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北京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室和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本书。该书的作者是中纪委、监察部、国家审计署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北京大学的部分专家学者。他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对策和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理论探索、政策研究和历史考察，书后附有报刊上发表的近期查处的一些案例和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大事记。由于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来谈反腐败问题，所以书名为《反腐败纵横谈》。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同志为本书题了词。我们对侯宗宾同志、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文科报刊阅览室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参加本书组稿、编稿、定稿和其他工作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丽梅、王武召、曲春兰、闵开德、陈永秀、张佩华、侯志山、徐雅民、鹿海青、魏国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赵林立同志参加了反腐败大事记的部分编写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该书在编辑方面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反腐败纵横谈》编委会

1994年3月

目 录

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初探	侯志山(1)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张建明(19)
关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反腐败斗争的 几个问题	薛木铎(31)
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惩治腐败	魏明铎(45)
坚持从严治党,狠刹腐败歪风	郭汝斌(56)
试论新形势下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李玉赋(70)
掌握腐败与反腐败的规律性现象	薛汉伟 刘思政(90)
社会主义改革与反腐败	阎志民 马 伟(102)
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 特点	刘 伟(113)
社会主义与廉政建设 ——关于反腐败的断想	吴仁文 戈 草(121)
法律与廉政	朱启超 林 雄(137)
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的若干问题的 思考 ——兼论腐败的思想根源	魏英敏(150)

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共产党员的	
权力观和金钱观	王武召 鹿海青(162)
建立权力运行的人民监督机制	
——论防治官僚腐败症的根本途径	王 东(174)
认真履行纪检监察职能,深入开展反腐败	
斗争	王丽梅(192)
审计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易仁萍(203)
怎样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张 文(210)
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监察制度	李茂春(223)
中国古代的反腐败措施	张 帆(244)
附录一	(260)
一个女经理的自毁之路	
.....	詹高尔 朱香山 于福源(260)
“煤老虎”现形记	刘国航(268)
疯狂“庄主”	
——禹作敏罪行录	高秀峰 刘林山(278)
创世纪荒诞	
——北京“卫益行”特大贿赂案内幕	
.....	牛爱民 牛 克 李 矗(301)
征战多哥	杨新民(311)
附录二	(321)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大事记(1978. 12—1993. 12)	
.....	(321)

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初探

侯志山

廉政教育旨在通过思想道德建设的手段,规范、引导从政行为,提高人们为政清廉的自觉性,以实现廉洁政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廉政教育。他在这方面不仅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建树,而且引导全党为其付诸实施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我国廉政建设重教育的传统优势,为防止执政党和人民政权腐化变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廉政建设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注重廉政教育,重视以思想道德手段引导、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根源和现实根源。

首先,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道德的行为导向作用。早在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他就提出了拯救中国当从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思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1]“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亦即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之所以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是因为“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

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2]为此，毛泽东在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一直把新思想、新道德建设视为“中心环节”。1918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而成立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新民学会，特别强调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氛围、砥励品行、缔造“新民”作为该会的一个重要宗旨。为防止旧势力和染有旧习气的人混入学会，该会规定了纯洁、诚恳、向上等严格的入会条件。这个团体的“新民”，“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3]。可以说，青年时代形成的重视思想道德导向、支配作用的思想，是毛泽东后来在领导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中，注重廉政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思想认识渊源。

其次，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廉洁政治是由人民政权的本质决定的。一方面，人民民主政治是人民政权的重要特征。人民民主政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从根本上颠倒了传统的官民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使干部成为人民的公仆。同时，人民民主政治使人民监督政府成为可能。有了人民的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能有效地抑制、防止权力腐败，保障廉洁政治的实现。另一方面，领导人民政权的共产党本质上是廉洁的政党，共产党的廉洁性质，决定和保证了人民政权的廉洁本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多次向全党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4]毛泽东认为，为政清廉与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起码要求，只有坚持为政廉洁，才能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

团的利益出发”^[5]。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其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励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说，共产党员和公务人员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他们决不可以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谋求任何私利。

共产党员和公务人员必须具备廉洁奉公的品格和作风，是人民政权的本质要求。廉洁奉公品格和作风的培养，固然需有多种途径，而教育则是基本的途径。廉洁奉公品格和作风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灌输教育对这一品格、作风的形成，不啻于春风化雨，是决不可以缺少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我们对党员和公务人员思想道德的核心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较之一般的“不贪不受”的更为高层次的要求，它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实践这一宗旨更需较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获得，更需加强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党员和公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只有通过扎扎实实的思想教育，激起党员和公务人员自身的努力，才能提高他们为政清廉和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廉政是与腐败相对立的。坚持反腐败也是人民政权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处于剥削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又是从剥削阶级政权中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某些“污毒”。剥削阶级思想对党员和公务人员的侵蚀，便是党和人民政权中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思想根源只能用思想教育的手段来解决。思想教育是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反腐养廉的一个重要手段。总之，党和人民政权养廉防腐的需要，则是毛泽东重视廉政教育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政权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对党员和公务人员进行包括廉政内容在内的思想灌输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6]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思想建党为基本特色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我党在根据地和苏区获得了局部和暂时执政的地位,共产党员为政廉洁的课题出现了。这一时期在戎马倥偬中,我党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廉政思想道德教育。毛泽东在起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的同时,写信给上海的党中央:“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党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7]与此同时,党在不少地方办起了党校,直接培训干部,并把宣传马列主义和其创始人的道德品质以及巴黎公社干部的道德风范作为授课的主要内容,开始有针对性地对苏区干部进行廉政思想道德教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地位相对巩固,党员和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更是被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和军事斗争相当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下,按理应把政治和军事列为工作的首位,而毛泽东却把思想教育列为“第一等的业务”,可见他对思想教育的重视。之后,全党开展了整风,虽然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但它作为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中也包括廉政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进城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

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他预见到，有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却经不起糖衣炮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攻击。为了预防这种情况，使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在建国前后大力进行了反腐蚀教育。全面执政以后，我党采用了整风学习、党内制度化学习和上党课、干部培训、新闻宣传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公务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反腐蚀教育。长期的思想灌输和廉政教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和公务人员健康、茁壮成长。

二

在廉政思想灌输中，毛泽东重视把正面的人格示范与反面典型的教育结合起来。他认为，进行廉政教育，除了实施理论灌输而外，还必须伴之以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而直观的、正反两方面的人格教育，就是普及廉政思想和道德风范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建国初期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三反”斗争中，他曾向全党明确指出：“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8〕}

毛泽东关于通过正面人格示范与反面典型教育相结合的途径进行廉政教育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塑造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典型示范是道德建设的重要特点。众所周知，我国不少封建王朝，也都重视塑造、宣传道德圣人、清官廉吏的形象和事迹，如“至圣先师”孔夫子、“青天大老爷”包拯、海瑞等。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的这一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他推重和树立的

学习的榜样有：战争年代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刘胡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无论如何不改变其革命节操”的吴玉章等。在建设时期，有甘作“螺丝钉”的雷锋，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艰苦创业的王铁人等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物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他一贯倡导的人格道德理想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和人间正气。因此，他通过讲演、写文章和题词等方式，亲自号召人们向这些典型学习，并要求传播媒介广泛宣传他们的事迹。目的在于发挥榜样的带动、引导作用，使人们见贤思齐，并借以感化党内外有某种不良思想作风的人改邪归正，从而在全社会普及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典型中有干部也有普通战士，他们的事迹有的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廉政问题，有的则与廉政无涉，但是作为倡导与营造一种普遍的道德风尚和精神氛围，这些典型的树立与宣传，无疑促进了整个社会思想道德的进步，因而也必然对廉政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和极大推动作用。

第二，身教重于言教，领导干部要作廉政的表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9]在人格示范中，毛泽东又特别重视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表率作用，认为这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所以他历来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0]为了使高级干部为首的领导干部成为廉政的表率或模范，他又总是主张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和重要的历史时期，他总是先给高级干部有的放矢地打预防针。

1944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初露端倪，郭沫若发表了阐述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因部分首领骄傲、腐化而招致失败过程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对郭文非常重视，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将它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67年，他向高级干部推荐《战国策·触詔说赵太后》一文，要求高级干部带头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

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作法很多，这里不详加引述，只想强调一下毛泽东本人的表率作用。作为党和共和国的领袖，在长期的廉政建设中，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他总是率先做到，带头在全党树立一种伟大的廉政风范。功盖天下的毛泽东从不谋私利、不徇私情。韶山冲毛泽东故居于1930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后，长时期没有人管理。全国解放后，湖南开始为他修缮故居，修建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他得知此事后，迅即写信给湖南省委，请他们立即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同年冬天，当时负责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的农会主席兼乡长，就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事宜写信给他。不久，毛泽东派儿子来到韶山，转达了他的意见：“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300元，作退押金；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11]毛泽东对子女一向充满深情，对他们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爱怜和关怀。可毛泽东对子女们在政治思想和生活上又要求甚严，从不允许他们享有丝毫的特权和特殊。在西柏坡，27岁的毛岸英多次提出想与当时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恋人成婚，毛泽东均断然不准。他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在他看来，“毛泽东的儿子”就更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头遵纪守法。这句令人百感交集的肺腑之言，毛泽东不只说过一次。抗美援朝送子上前线说的是这句话，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对小女儿李讷说的也是这句话。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李讷考入大学之后，毛泽东严厉禁止用小车接送她上下学。

“由于不许接送，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见面老说饿。我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毛泽东知道后，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12]

毛泽东对待亲友的态度也是如此。1949年开国前后，湖南的不少亲友纷纷投书毛泽东以示祝贺，有的则在信中提出了诸如请求推荐参加工作等要求。当时百废待兴，人民政府招募了许多工作人员，有不少干部的家属、亲友也都进京参加了工作。毛泽东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他对要他安排工作的要求“一律谢绝”，就连至亲杨开智提出要来北京工作时，毛泽东也仍然按规矩办事，要他在当地听凭政府“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来京工作。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范。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生活可谓惊人的简朴。战争年代有时打了胜仗，他唯一的“奢求”是吃碗红烧肉补补脑子。进城后，这位“中国第一人”仍然保持“农民生活习惯”，通常是一碗二米饭，两菜一汤，很多时候一缸麦片粥就霉豆腐便是一顿饭。内衣内裤、袜子总是补了又补，床上用品“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是这些东西”。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和他们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时所用的‘铺张浪费’一词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曾经过集体生活，在食堂里吃饭达20多年之久；他们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每天仍然工作12到15个小时，过着相对来说简朴的生活。”^[13]“斯人已矣，风范长存”，光被四表、彪炳青史的毛泽东风范不仅仅属于毛泽东时代。他那感人

至深、催人奋进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不但过去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代干部，而且对于今天的广大干部仍具有很大的感召和鞭策作用。

第三，重视反面教员、教材的作用。这与人格示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前者旨在使人“见贤思齐”，后者则令人“见不贤而内省”，二者的作用相反相成。毛泽东曾把发挥反面典型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种牛痘”，认为这可以“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处理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案时，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前，案犯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带罪立功。毛泽东接信后立即给法院负责人回信，坚决支持法院的判决。他严正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个多年的党员、多年的红军，所以在他犯下如此罪行时更应处决他。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还宣布这封信，以使“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在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坚持了这一思想。建国初期在处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上，毛泽东的着眼点也在于处决这两个反面典型对人们的教育作用。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也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为了充分发挥反面典型的教育作用，毛泽东不但主张要抓大案要案，而且要求选择、利用典型案例对人们进行教育，如在报纸上对一些违法违纪案件公开曝光等。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重视案例教育已成为我国廉政教育的一个传统作法。通过电视录像、编写典型案例材料等方式展示违法违纪分子演变的轨迹和规律，使更多的人为之警醒，以期防患于未然。

三

普及廉政思想和道德风范,提高为政清廉的自觉性,在坚持外部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开辟人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途径,这是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毛泽东认为,自我批评的方法,则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4]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大段摘引毛泽东的论述,是因为这段话较为详尽透辟地阐述了他关于运用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这一创造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廉政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它阐明了以自我批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的必要性。毛泽东在这里把剥削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比作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须知,在党和人民政权的建设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这种侵蚀与反侵蚀的斗争。前面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思想和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